

1936年5月，鲁迅在与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认为，自新文学运动以来，中国涌现出来的最优秀的杂文作家是：

周作人、林语堂、鲁迅、陈独秀、梁启超

周作人杂文代表作选

绅士与流氓的

拼搏

中国
现代
五大
优秀
杂文
家
丛
书

甘肃人民出版社

●李伏虎 编选

绅士与流氓的拼搏

——周作人杂文代表作品选

甘肃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连凌云

封面设计：高海军

绅士与流氓的拼搏

——周作人杂文代表作品选

李伏虎 编选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第一新村123号）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75 插页 2 字数 240,000

1998年3月第1版 199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

ISBN 7-226-01875-6/I·504 定价：14.80元

中国现代五大优秀杂文家丛书

编 选 说 明

《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3期发表了著名翻译家安危首次翻译的《埃德加·斯诺采访鲁迅的问题单》和《鲁迅同斯诺谈话整理稿》(原文献用英语写成)。据翻译者研究,1936年四五月间,美国著名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以问题单的形式,就当时中国文学的现状,采访过鲁迅。问题单共提出了23个大问题、15个小问题,涉及了1936年4月前中国现代文坛上作家的倾向、流派,各种文学体裁创作的最优秀作家,左翼文艺运动的成就和现状,政府的文艺政策,外国作家作品的翻译及其对中国现代作家的影响等诸多方面。鲁迅认真地作了简要回答。因此,这份文献可以视为鲁迅逝世前对中国现代文学史发表的系统评论。鲁迅在回答这些问题时,认为中国现代最优秀的杂文作家依次是:周作人、林语堂、鲁迅、陈独秀、梁启超。60年过去了,事实证明鲁迅这一论断是公正的,经得住时间的考验。根据鲁迅这一论断,应甘肃人民出版社之约请,我

编选了《中国现代五大优秀杂文家丛书》(5本),以期比较系统地展现本世纪30年代中期前,特别是二三十年杂文创作的主流,为广大读者奉献一套简明实用的杂文选本。

杂文是以论说为主的一种散文。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中认为,中国现代散文之所以在“五四”时期走向成熟,有两重原因:一是外援,一是内应。“外援即是西洋的科学哲学与文学上的新思想之影响,内应即是历史的言志派文艺运动之复兴。假如没有历史的基础这成功不会这样容易,但假如没有外来思想的加入,即使成功了也没有新生命,不会站得住”。另外,现代杂文的产生与发展,还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中国现代“急速的剧烈的社会斗争,使作家不能够从容的把他的思想和感情熔铸到创作里去,表现在具体的形象和典型里;同时,残酷的强暴的压力,又不容许作家的言论采取通常的形式来表现他的政治立场,他的深刻的对于社会的观察,他的热烈的对于民众斗争的同情……”(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于是,便采用杂文这种短小精悍、生动活泼的形式来表现。中国现代杂文是借助报刊杂志这类现代媒体对旧中国封建专制主义、蒙昧主义和禁欲主义进行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而走上文坛的,其源头肇始于梁启超1899年与1902年在日本创办的《清议报》与《新民丛报》。梁启超在这两种报纸上发表了100多篇文章,使他成为戊戌到辛亥年间最著名的资产阶级宣传家。由他创作的笔端常带感情的新文体,可以看作古代杂文到现代杂文的一种过渡,他的《新民说》、《自由书》、《欧游心影录》,看作杂文集也不为过。

陈独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帅,是中国现代杂文的拓荒者,他在1918年4月15日卷4号《新青年》上开设的“随感录”专栏,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只登杂文的专栏,在他的带动

与号召下，鲁迅、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等都在这一时期开始了杂文创作。他在《新青年》与《每周评论》等刊物与稍后创刊的《向导》周报、《布尔什维克》等共产党机关刊物上开设的“寸铁”专栏上，发表了670多篇“投枪”与“匕首”式的极短小的杂文，成为“五四”到大革命失败时期大小历史事件的铁的见证。

在杂文的发展史上，有一个刊物起了特殊的作用，这就是《语丝》。《语丝》1924年11月创刊，1931年终刊，出版了7年。据鲁迅在《我和语丝的始终》一文中回忆，该刊向来的编法，“就是：凡社员的稿件，编者并无选取之权，来则必用，只有外来的投稿，由编辑者略加选择，必要时且或略所删除”。“但在不经意中显示一种特色，即：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除”。鲁迅同时指出：“不愿意在有权者刀下，颂扬他的威仪，并奚落其敌人来取媚，可以说，也是‘语丝派’一种几乎共同的态度。”“语丝派”的努力使中国现代杂文在20年代中期就达到了顶峰，鲁迅和周作人就是“语丝派”中产生的双峰并峙的杂文大家。鲁迅先后在语丝上发表杂文150多篇，他的《野草》的全部，《坟》、《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而已集》、《三闲集》中的大量杂文是在《语丝》上发表的。周作人在《语丝》上发表杂文达432篇之多，他的《雨天的书》、《泽泻集》、《谈龙集》、《谈虎集》、《永日集》中的相当一批杂文是在《语丝》上发表的。而林语堂，则是“语丝派”第二代作家中的佼佼者，他的第一本杂文集《翦拂集》中的杂文几乎全部是在《语丝》上发表的。30年代初，周作人创办了杂文刊物《骆驼草》，提倡闭户读书，走入草木虫鱼。林语堂先后创办了《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杂文刊物，提倡“闲适”与“性灵”。只有鲁迅仍一如既往，以杂文作“匕首”和“投枪”，进行韧性的战斗。不

过，从另一角度看，周作人和林语堂的那种消极的转化，却开拓了中国现代杂文的题材领域，尤其是周作人的专谈衣食住行、草木虫鱼的杂文及科学小品，虽然与狼虎横行的时代格格不入，却大大增强了现代杂文的知识性与趣味性。

五大杂文家的杂文数量巨大，异彩纷呈。在编选中，为了更好地显示每位作家作品的主要内容特色，本丛书对每个作家的杂文按内容进行了粗略的分类——虽然这种分法不一定准确。在只有20万字左右的每个选本中，编者在尽量照顾每个作家杂文内容和风格的多样性的同时，稍稍突出了某几个方面的内容。如周作人，突出其有关批判国民性、总结历史教训、对妇女与儿童的研究以及性心理与性教育方面的文章。鲁迅，则突出其批判封建专制主义，批判国民性、国粹主义，论改革等方面的文章。在编选中，参考了五位作家作品的多种版本，力图保持其作品的本来面目，对于不符合现代汉语规范的字词，基本上保持原貌，不予更动。

编选一个满意的文学作品选本，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没有对作家作品的全面熟知，没有对作家作品特色的整体把握，没有科学合理的编选体例，是做不好的。虽然编者和出版社有关同志都尽了很大的努力，但是限于水平和时间，遗珠之憾和错讹在所难免，敬祈专家、读者不吝指正。

编选者

1997. 7. 13

周作人杂文与科学的常识教育

(代序)

李伏虎

1923年1月1日，周作人发表了《妇女运动与常识》一文，提出了对国人进行现代科学常识教育的问题。他指出：“现在的中国人民，不问男女，都是一样的缺乏常识，不但大多数没有教育的人如是，便是受过本国或外国高等教育的所谓知识阶级的朋友也多是这样。他们可以有偏重一面的专门学问，但是没有融会全体的普通知识，所以所发的言论就有点莫名其妙，终于成为新瓶装的‘浑’酒。”

对国人进行起码的常识教育的最早提倡者是梁启超。1910年2月20日，梁启超创办的以鼓吹立宪为宗旨的《国风报》在上海出版。其刊于《申报》的广告中说：“本报以忠告政府，指导国民，灌输世界之常识，造成健全之舆论为宗旨。”是年11月，梁启超提议发起成立“国民常识学会”，后因经费无着而搁浅。

1910年3月2日，梁启超在《国风报》第2期发表了《说常识》一文，表达了他对中国人缺乏最起码常识的忧虑。梁启超认为，作为一个能够自立的人，必须具备常识，作为国家一分子、世界一分子，不具备该国与世界必须之常识，就不能在该国

与世界上生存，只能被淘汰而归于失败。而今天的常识，都是古今中外无数伟大天才人物经过无数次失败才发现总结出来的简单的确实的原理，只有我们了解了这些公理和原则，按照这些公理及原则行事，作出的判断才不致有大的失误；如果没有这些常识，十有八九要把事情弄坏。

梁启超认为，人类获得常识的途径有两个方面：一半得之于学校教育，一半得之于社会教育。学校教育是树立常识的基础，社会教育是常识教育的扩大。现代文明国家没有不把中小学义务教育作为常识教育的基础，从而养成国民对常识的融会贯通，而社会教育则主要靠新闻舆论、公共活动的熏陶和锻炼。以学校教育而论，学科编制不完善，教科书不系统，想从当时的学校教育中寻求中国和世界的常识，是不可能的。因此，梁启超痛心疾首地断言，全国四万万人中，没有一个为有常识者。因此，他身体力行，创办报纸，撰写文章，发表演讲，向国人宣传常识，特别是政治常识。

或许是受到梁启超的影响，周作人也非常重视科学的常识教育。他的许多杂文是有关常识教育的，他在《妇女运动与常识》一文中指出：“妇女运动在中国总算萌芽了，但在这样胡里胡涂，没有常识的人们中间，我觉得这个运动是不容易开花，更不必说结实了；至少在中坚的男女知识阶级没有养成常识以前，这总是很少成功的希望的。妇女运动是怎样发生的呢？大家都知道，因为女子有了为人或为女的两重的自觉，所以才有这个解放运动。中国却是怎样，大家都做着人，却几乎都不知道自己是人，或自以为是‘万物之灵’的人，却忘记了自己仍然是一个生物。在这样的社会里，决不会发生真的自己的解放运动的。我相信，必须个人对于自己有了一种了解，才能立定主意去追求正当的人的生

活。”

因此，周作人将自己认为“正当的人生常识”分三类五组二十种介绍给读者。

第一组的知识以个人本身为主，分为身心两部，生理部分又注重性的知识。

第二组是关于生物学的知识。这一类又分为两部分，一类是有关生物共通的生活规则，即是进化与遗传的规律，包含普通的动植物及人类学。一类是社会学，实际是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周作人说，“凡宗教道德制度技术一切的发达变迁都归在内，范围很是广大，其专事记录者为历史。以上两组知识最为切要，因为与我们关系至为密切，要想解决切身的重要问题，都非有这些知识做根柢不可。譬如有了性的知识可以免去许多关于性的黑暗和过失；有了文化史的知识，知道道德变迁的陈述，便不会迷信天经地义，把一时代的习惯当作万古不变的真理了。”所以在人生的常识中，这两组可以算是基本的知识。

第三组是关于天文学知识，第四组是数理化基础科学知识，第五组是关于文学，包括艺术的全部即音乐与美术。

梁启超在《说常识》中强调的常识主要是社会科学方面的政治、历史、法律、地理，自然科学方面的数学、物理，以及文学艺术。而周作人却强调了生物进化论与遗传学，文化人类学与民俗学对于现代人认识自己的重要性。可见，更多地涉猎了西方以上学科的周作人，在常识教育方面要更全面得多。

周作人认为，养成这些常识，在外国没有什么困难，但在中国，却没有一本救急这“常识荒”的书，中国的专门的学者们，他们“只是攀住了一个角落，不能融会贯通的一瞥人文的全体”。因此，在1926年7月所写的《论做鸡蛋糕》一文中，他将1923年

开的这张庞大的常识单子大大简化了，他希望有人能写四本小册子，二十万言，介绍下面两类常识：

一、自然科学类，内有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三种。

二、社会科学类，内只人类学一种，但包含历史学在内。

为了普及这一常识，他设计的详细计划是，“先从生物学入手，明了了生物的生理的及其一生的历史，再从进化论去看生物变迁之迹，就此过渡到地质方面，研究我们所住的这块地的历史及现状，以后再查考地球在太阳系的位置，非太阳系与别的星星的关系，那就移到天文学上去了。这是右翼，左翼是人类学，青年先从这里知道民族分类的情形，再注意于‘社会人类学’的一部分，明白社会组织以及文化道德的发达变迁，于是这号称万物之灵的人类的历史大旨可以知道了。此外在右翼还可以加入理化数学，左翼加入政治经济，但如有了上边的基本知识也就足以应用，不但《女儿经》及其他用不着，就是不读圣经贤传，在一生里也可以没有什么过恶了……”

周作人对常识教育的这一规划，以人文的全体为前提，以人为中心来认识世界和人类自己，这是符合儒家人文主义的精神的。早在1924年11月，在《生活之艺术》一文中，周作人介绍了蔼理斯的主张，“生活之艺术只在禁欲与纵欲的调和”，“他排斥宗教的禁欲主义，但以为禁欲亦是人性的一面；欢乐与节制二者并存，且不相反而实相成。人有禁欲的倾向，即所以防欢乐的过量，并即以增欢乐的程度。”周作人认为，“生活之艺术这个名词，用中国固有的字来说便是所谓礼”，“如《中庸》的起头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照我的解说即是很明白的这种主张。……我不是说半部《中庸》可以济世，但以表示中国可以了解这个思想。”

周作人的目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中国现在所切要的是——一种新的自由与新的节制，去建造中国的新文明，也就是复兴千年前的旧文明，也就是与西方文化的基础之希腊文明相合一了。”这种以生活之艺术重新解释的“礼”，就是以儒家中庸哲学为核心的，用西方系统的科学常识武装的儒家人文主义新体系。这种儒家人文主义主张对异端的宽容，反对一切专制和迷信，反对统一思想，反对君王或群众的专政，这样，他的思想的主旨，就与1920年9月梁启超在《〈改造〉发刊辞》中所标榜的思想殊途同归了。

1929年，周作人提出了“闭户读书论”，开始从叛徒走向隐士，从孔融走向陶渊明。然而，他对这种尚未公开打出旗号的儒家人文主义情有独钟。1932年11月，他在《〈杂拌儿之二〉序》中，称赞俞平伯的《中年》与几篇讲两性及亲子问题的文章兼有思想之美，“这是以科学常识为本，加上明净的感情与清彻的智理，调合成功的一种人生观，以此为志，言志固佳，以此为道，载道亦复何碍。”一向对“载道”攻击不遗余力的周作人，却在这里大声疾呼，要为自己新儒家人文主义思想去“载道”了。

大约在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周作人公开地打出了儒家精神的招牌，1944年7月，他在《我的杂学》中说起自己杂览的知识，“只能批八个字云，国文粗通，常识略具而已。我从古今中外各方面都受到各样影响，分析起来，大旨如上边说过，在知与情两面分别承受西洋与日本的影响为多，意的方面则纯是中国的，不但未受外来感化而发生变动，还一直以此为标准，去酌量容纳异国的影响。这个我向来称之曰儒家精神。”

这种儒家精神坚持对国民进行持久的科学常识的教育，以养成他们的科学思想，而这是中国儒家传统中最缺乏的。他在1928年6月写的《妇女问题与东文文明等》一文中，公开批评梁启超

欧游归国后标榜的精神文明即东方文明，周作人认为，文明本身就包含物质与精神两个方面，分不出哪个是物质的，哪个是精神的，他认为把东方文化鼓吹为天下之至宝，“这种幼稚的夸大也有天真烂漫之处，本可以一笑了之，唯其影响所及，不独拒绝外来文化，成为思想上的闭关，而且结果变成复古与守旧，使已经动摇之旧制度旧礼教得了这个护符，又能支持下去了。”然而这位“五四”老战士一时义愤，却忘记了自己不也是在标榜儒家精神吗？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

在这篇杂文中，他尖锐地指出，“其次也就是末了的一件事，即是科学思想的养成。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科学思想都是不可少的，但在妇女问题研究上尤其要紧。”周作人认为，孔子虽然说过“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的话，但没有佛教、道教的不净观为害大，其实在中国都是以萨满教为基本，“凡是关于两性间的旧道德禁戒几乎什九可以求出迷信的原义来。要破除这种迷信与礼教，非去求助于科学知识不可，法律可以废除这些表面的形迹，但只有科学之光才能灭它内中的根株。还有，直视事实的勇气，我们也很缺乏，非从科学训练中去求得不可。”为此，他批判了当时讲主义的人们的浪漫与幻想，谈革命文学的人大吵大嚷着光明到来了，农民都觉醒了，明天便是世界大革命，然而对于农民实际生活的蒙昧、卑劣、自私则决不准说。“关于妇女问题也有相似的现象，男子方面有时视女子若恶魔，有时视若天使，女子方面有时自视如玩具，有时又视如帝王；但这恐怕都不是真相吧？人到底是奇怪的东西，一面有神人似的光辉，一面也有走兽似的嗜好，要能够睁大了眼冷静地看着的人才能了解这人与其生活的真相。”

这种儒家人文主义的科学思想，是直接继承了中国古代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疾虚妄”的精神，正如他在《药味集·序》中

所说的，“孔子曰，吾少也贱，多能鄙事。鄙人岂敢高攀古人，不过少也贱则相同，因之未能求得一家之学，多务杂览，遂成为艺术界中打杂的人，亦不得已也。若言思想，确实是儒家的正宗。昔孔子诲子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鄙人向来服膺此训，以是于汉以后最佩服疾虚妄之王充，其次明李贽，清俞正燮，于二千年中得三人焉。疾虚妄的对面是爱真实，鄙人窃愿致力于此，凡有所记述，必须为自己所深知确信者，才敢着笔，此立言谨慎的态度，自信亦为儒家所必有者也。因此如此文章思想皆是国粹，或云现代化的中国固有精神，殆无不可。”二千年文明史，周作人只看中三个人，这种苛求大概出于不得已吧！

这种科学常识的养成是以反对一切似是而非，反对一切宗教迷信为前提的。这种科学的精神可以用生理学识破“生病时便相信符水可以止痢，石燕可以催生，而静坐起来‘丹田’里有一股气可以穿过横膈膜，钻通颅首而出去了”的迷信，不再相信“地球是宇宙之中心，人身不洁，性欲罪恶，道德不变”这些天经地义的谬见。正如他在《螟蛉与萤火》中说的，“中国人拙于观察自然，往往喜欢去把他和人事连接在一起，最显著的例，第一是儒教化，如鸟反哺，羔羊跪乳，或枭食母，都一一加以伦理的解说。第二是道教化，如桑虫化为果蠃，腐草化为萤。这恰似‘仙人变形’与六道轮回又自不同。”

总之，运用科学精神对中国传统的一切迷信与狂信进行揭露和批判，是他杂文一个重要内容。“中国的愚人先前相信华人人心中，夷人才偏右之类的胡说，自不必说，连阮元这样的大学者也居然相信逆妇变猪。”在《刘青园〈常谈〉》一文中，就详细抄录了阮元在《广陵诗事》卷九中关于逆妇变猪的大段记事后指出，“阮芸台本非俗物，于考据词章之学也有成就，乃喜记录此等恶滥

故事，殊不可解……”接着，周作人揭露了中国人相信鬼神的迷信，他指出，“中国人虽说历来受儒家的熏陶，可是实在不能达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态度，一面固然还是“未知生”，一面对于所谓腊月二十八的问题却又很关心，于是就参照了眼前的君主专制制度建设起一个冥司来，以寄托其一切的希望与喜惧。这是大众的意志，读书人原是其中的一分子，自然是同感的，却要保留他们的优越，去拿出古人说的本不合理的‘神道设教’的一句话来做解说，于是士大夫的神学也就成立了。民间自有不成文的神话与仪式，成文的则有《玉历钞传》、《阴骘文》、《感应篇》、《功过格》，这在读书人的书桌上都是与孔教的经有并列的资格的。”然而，这种文人思想受神道教的支配发生在名人与大学者身上，毕竟是十分遗憾的，然而我们不能苛求古人，求全责备，一向主张宽容的周作人，在评价古代思想家时却恰恰犯了苛求的错误。

周作人把杂文看作进行科学的常识教育的工具，他把风趣与常识看做优秀杂文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标准，他在《〈一蕪轩笔记〉序》中说过，“文章的标准本来也颇简单，只是要其一有风趣，其二有常识。常识分开来说，不外人情与物理，前者可以说是健全的道德，后者是正确的知识，合起来就可称之曰智慧，比常识似稍適切亦未可知。风趣今且不谈，对于常识的要求是两点：其一，道德上是人道，或为人的思想。其二，知识上是唯理的思想。我相信中国道德政治上有两样思想，甲是为人民，孟子所谓民为贵的思想；乙是君主，韩公所谓天王圣明臣罪当诛是也。”在这里，他认为“到了现在，民国早已成立，在中国最适合，最旧也最新的，无疑地是这民为贵，为人第一的仁的思想，无论思想应得如何的自由，在民国的道德与政治思想上总不能再容颂扬专政的分

子……”在这里，周作人再三强调做文章的人要不迷信，可见，他是自觉地把杂文作为对国民进行常识教育的工具来使用的。

周作人解放前后在《亦报》上发表了上千篇杂文，大多数是谈常识的，这些有关吃喝玩乐、花鸟虫鱼、衣食住行、文房四宝的杂文，是在对人们长期习而不察的身边琐事，给以科学的研究与解说，从这个意义上说，草木虫鱼又有什么不好？

1950年7月16日，他写的《迷信的辫子》一文，介绍了终生使他得益匪浅的唯物主义观点，“我平常总是很谦虚的，但是有一件事不能硬否认，便是自己觉得很幸福，因为我没有迷信，比较有些人可以免掉许多忧虑和恐怖。我不相信有魂灵，所以神仙、鬼、妖怪、变化这些花样都于我不存在，虽然我爱听关于这些的故事，也有兴趣打听相关的信仰风俗，不过都是了解人情的资料而已。”他又说，“五行八卦，天干地支各样说法，我相信都是虚妄，对于旧日以此为根据的医卜星相一裹脑儿地否认，这也就清静了不少，无论怎么金克木，或子午一冲，于我均毫无关系。”

目 录

周作人杂文与科学的常识教育（代序）	
《贞操论》	（3）
《结婚的爱》	（11）
“重来”	（14）
读《欲海回狂》	（16）
葛理斯的话	（19）
狗抓地毯	（22）
上下身	（25）
“净观”	（27）
萨满教的礼教思想	（29）
“半春”	（31）
读《性的崇拜》	（33）
北沟沿通信	（36）
抱犊谷通信	（42）
女革命	（46）
妇女问题与东方文明等	（48）
《性教育的示儿编》序	（52）
《性的心理》	（54）
关于孟母	（60）